

· 本刊特稿 ·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写在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

欧 阳 淞

2023 年的 10 月 15 日，是习仲勋同志的 110 周年诞辰。

80 年前，即 1943 年的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同志再次莅临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 22 人予以奖励。习仲勋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同志为 22 名获奖者的奖状（均为一块长约一尺、宽约五寸的漂白布）逐一题词，给习仲勋同志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上款是“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份十分珍贵的题词，是毛泽东同志对习仲勋同志的高度赞誉，也是习仲勋同志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

习仲勋同志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个人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岁月里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地区举起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在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他 21 岁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2 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 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9 岁受到错误处理，65 岁复出，67 岁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习仲勋同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传奇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

习仲勋同志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一往无前、矢志不移，是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的坚定革命者。在民族危亡和社会苦难中成长的习仲勋同志，从小就向往光明、立志救国救民。他曾说过“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习仲勋同志少年时代就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 年 5 月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屠杀政策，习仲勋同志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1928 年春，习仲勋同志在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时，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关押。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继续斗争，转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那时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就在习仲勋同志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一次又一次站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1930 年，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习仲勋同志受党组织委派，深入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在他和刘林圃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1932 年 4 月爆发了震惊陕甘地区的“两当兵变”，创建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同志担任支队队委书记。尽管这次斗争后来在转战中失利，但它有力地策应了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两当兵变”因此而载入了党的史册。以“两当

兵变”为起点，习仲勋同志开始经受武装斗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习仲勋同志之所以能在危难面前选择奋斗，在逆境面前选择坚定，在是非面前选择正义，在风浪面前选择从容，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胸中有信仰、心中有党。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习仲勋同志一生信仰如炬，理想如帜。他用毕生的奋斗探索，诠释了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真谛。

习仲勋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而浴血奋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开创革命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他曾说“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组织一系列武装暴动失败后，习仲勋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开始思考“陕甘革命道路究竟该怎么走”的问题。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创建了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习仲勋同志以极大精力领导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他和刘志丹同志实行的“狡兔三窟”式多区域战略布局，后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革命道路，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污蔑为“逃跑主义”“稍山主义”，但他们仍不断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坚持、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当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的时候，1935年9月，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关押。危急时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长征到达陕甘，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并为他们安排了工作。陕甘这块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得以保存，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日后又发展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习仲勋同志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群众疾苦，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始终“以党为重”“以党为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因错误肃反遭关押获得释放平反后，他告诫受到冤屈的同志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听从党中央的调遣。习仲勋同志曾强调指出“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习仲勋同志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他都能够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自己在“左”的统治和流毒严重危害下没有犯过“左”的错误，而且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正确执行。在陕甘宁边区，无论是在关中守卫边区南大门，还是在绥德地区保卫边区北大门，习仲勋同志始终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在关中，他领导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在绥德，他深入农村、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三三制”政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坚决抵制和纠正正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称赞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土地改革中要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为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偏差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仲勋同志为革命战争胜利而英勇奋战，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而呕心沥血，是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卓越领导者。作为党在西北地区早期兵运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习仲勋同志很早就与武装斗争这个中国革命最大的特点结下不解之缘，也很早就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在总结关中党的工作经验时指出：关中党的发展，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没有一天离开了武装斗争。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同样表现在关中的党里。习仲勋同志高度重视军事斗争，也善于领导军事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与领导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中，他领导军民多次击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并与张宗逊等同志一道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参战部队仅用不到三天时间，便将胡宗南部击溃，全面收复了失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组织策动横山起义，参与指挥了榆横战役。1946年7月至9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习仲勋同志接连接到毛泽东同志9封亲笔信，他按照毛泽东同志部署，组织南线出击，接应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中原突围胜利返回延安。在转战陕北期间，他协同彭德怀同志率西北野战兵团，在边区人民支持下，与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周旋，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一系列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其中的青化砭一战，仅用一个多小时，即歼灭胡宗南部31旅近3000人，整个战斗速战速决，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习仲勋同志既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等职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一起，或率部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壮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崇高的荣誉。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习仲勋同志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9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翻开了新的篇章。他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宣传部、政务院、国务院、广东省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进步，为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经济特区建设，为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宗教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其中，他晚年写下的人生画卷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页，就是作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党中央领导和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广东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探索试验。习仲勋同志也因此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百业待举。年过花甲的习仲勋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复出，接受党中央委派到广东工作的。此时，习仲勋同志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但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表示无条件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奉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在广东的两年零八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同志历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习仲勋同志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在这片南国热土上，团结带领省委“一班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胆实践、开拓创新，揭开了广东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习仲勋同志到任时，广东同全国一样，百废待兴。人民群众急切盼望发展经济，使国家尽快振兴起来，使人民生活尽快富裕起来。但是，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僵化的体制机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开

始后，习仲勋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讨论形式上是一个理论问题、哲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中，习仲勋同志是最早一批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省区市委书记；在全国各省区市的党委机关报中，《南方日报》是最早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报纸之一。在1978年6月召开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习仲勋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习仲勋同志和省委旗帜鲜明地带领全省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促进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在广东，“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错误也积累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明确指出“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从隆重悼念陶铸同志到雷厉风行解决污蔑彭湃、杀害彭湃家属的冤案；从为“李一哲事件”平反到推动反“地方主义”案件复查平反，习仲勋同志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大刀阔斧开展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仅“李一哲事件”的主要成员，习仲勋同志就先后十次予以会见。他还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妥善解决了困扰广东多年的偷渡问题。针对长期以来偷渡问题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偷渡外逃人员一律被当作刑事犯来打击的情况，习仲勋同志严肃地指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不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还说“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就能说出这番话来，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正是习仲勋同志的正确判断、鲜明态度和一系列标本兼治的办法，使得困扰广东多年的偷渡问题很快得到缓解并逐步自行消退。在习仲勋同志和省委的领导推动下，有20多万人先后卸下了历史包袱，干部群众的团结得到增强，局势得到稳定，广东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率先提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习仲勋同志和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习仲勋同志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广东省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这一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党中央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由此，在广东大地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奏响了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时代号角。一年之后，习仲勋同志等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工作时，进一步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等问题，得到中央书记处的肯定，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积极推动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仲勋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决策部署，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他还说“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他和省委带领全省人民抓住机遇、锐意进取，打破封闭僵化的条条框框，迈出了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坚定步伐。在经济特区的创建过程中，习仲勋同志深感责任重大，强调说“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在他和省委的领导支持推动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建设逐步展开，实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的工作实现突破，“三来一补”得到促进，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陆续兴建。所有这些，奠定了广东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与此同

时，广东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农村鼓励“三定一奖”“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在城市推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清远经验”，取得良好效果，引起全国关注。广东还在全国率先推进农副产品购销体制改革，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放开价格；对“统购包销”的商业流通体制进行改革，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活跃农副产品市场、改善人民生活进行了有益探索。此外，计划、交通、科技、教育、劳动工资等领域的改革也取得初步进展。习仲勋同志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和省委一班人带领广东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也为国家制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习仲勋同志还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习仲勋同志和省委以整风精神认真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切实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班子队伍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

习仲勋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光辉业绩和卓越贡献深深铭记在我们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我们学习和纪念习仲勋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不渝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格；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一生热爱人民、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就要学习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崇高风范，为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懈奋斗。

在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的 1999 年 10 月 1 日，86 岁高龄的习仲勋同志参加了国庆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广场欢腾的人群，他深情地感叹道：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为了人民江山，习仲勋同志出生入死、百折不挠；为了人民利益，习仲勋同志夙兴夜寐、赤胆忠心。如今，人民江山坚如磐石，伟大事业前程似锦，我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习仲勋同志在革命、建设、改革漫长岁月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理想信念、真切的为民情怀、高超的领导艺术、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高尚品格，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在新的时代熠熠生辉、永放光芒。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文作者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赵 鹏）